

先鋒

第六七期合刊

定價：零售大洋三分

通訊處：北京大學一院號

房轉

目錄

紀念廣暴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
「紅軍」問題
上海電話罷工的教訓
怎樣估計革命形勢
北大學學生援助陳獨秀
國際反對派鬥爭情報
請看馬哲民底裸體跳舞
更正

(剛平)
托洛斯基
彭述之
托羅斯基
鐵車等譯
敬言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廣暴」

剛平

廣州暴動的五週年到了。民國十六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英勇的廣州工人以血的鬥爭第一次在中國實現蘇維埃政制，第一次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偉大的中國工人解放中國解放自己的鬪爭，雖然只存在了三天就遭失敗，但他是怎樣的值得我們認識和紀念呵！

廣州暴動本身的最大意義，就是牠證明中國的革命應該是什麼性質：當時廣州工人很顯明的提出了「工人監督生產」，「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和房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打倒國民黨」等中心口號；廣州工人很顯明的走上了共產黨和工人領導一切貧苦民衆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州暴動的事實撕碎了第三國際史大林派的「加入國民黨」，「不要立刻退出國民黨」，「四個階級聯盟」，「不能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不能馬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擁護武漢革命政府，不應成立蘇維埃」等等的孟塞維克反革命路線；廣州暴動完全証明了共產國際左派反

對派托洛斯基同志等的不斷的警告與建議之正確！

廣州暴動的慘敗又教訓了我們什麼呢？廣州暴動的慘敗，教訓了暴動和蘇維埃的策略！自從民十六那一年的「四一二」上海屠殺以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已統治了北伐中所佔領的各省區，工農羣衆之秘密的和公開的組織已遭到空前的摧殘與潰散，這時候很顯然的革命高潮已開始低落，很顯然的共產黨應使無產階級變攻爲守，以培養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來，當時就使廣州工人因爲階級憤恨，要想暴動舉事，但共產黨也應該耐心的向他們解釋革命形勢已開始退落，不宜於在廣州一隅便馬上舉行暴動（當然，如果廣州的工人階級一定憤於要幹，共產黨就應該站在最前線者，以減輕犧牲）。可是共產國際史大林派居然昏聩發狂：說是在廣州暴動前夜，「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開始」（第三國際擴大會議第八次決議案）！因此，不但沒有見到廣州工人的堅決表示要舉行暴動，不但沒有見到任何的解釋勸阻，而就在廣州暴動前一天（即二十四小時內！）命令宣布成立蘇維埃，舉行了暴動！過去



史大林派以「加入國民黨」「擁護武漢政府」等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斷送了上海漢口長沙的無產階級，此刻這一廣州的新的慘劇，便是在「人工」製造的和小資產階級性急盲動的政策下演了出來！至於不在大罷工過程中就去成立蘇維埃，（即大罷工委員會的作用）而直到了暴動的前夜才來成立蘇維埃，那更是史大林不懂得運用蘇維埃策略的機械的昏聩的表示！

所有以上教訓，只有共產國際左派反對派才能明確的得出來。官僚主義的史大林派得出些什麼教訓呢？他們只說是，技術上的不好。（如某個糾察隊沒有組織妥當，某個同志坐在家裏不敢鬥爭等等）！他們有沒有接受或了解廣州事件的根本教訓呢？我們知道，直到今天還沒有！！

可是今天的史大林派又是「刮刮叫」的革命家了！整個中國無產階級還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和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之下，整個中國的無產階級還是大部份在舉行經濟性的和微薄的部份的政治性的罷工的時候，整個中國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舉行任何政治大罷工，還沒有到了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候，而我們的史大林派居然拋棄爭取最高的民主要求——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高喊其「蘇維埃」「紅軍」；他們居然以南方一部份農民的鬥爭口號硬想目前中國無產階級來跟着跑；甚至夢想領導農民武裝，不用城市無產階級自身的起來，而就能夠奪取大城市，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建立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政權」！

史大林派如果再繼續他們的錯誤政策，我們可以預料到幾種可能的前途：或則當工人政治鬥爭更加活躍的時候，只是因為缺乏更高的民主口號（如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省市代表大會等）去配合形勢，那末他們的部份的蘇維埃暴動不免要使剛剛抬頭

的工人階級受到極大的摧殘；或則當城市無產階級起來革命，而同時農民武裝攻打城市的時候，那末他們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和農民政策不免要和城市無產階級對立，發生極大的階級糾紛和危險（俄國十月革命中的事實證明了這點。）

可是這一切困難和障礙，只有正確的無產階級立場，明確的思想和政策，才能克服。目前也只有左派反對派在擔負這種偉大艱苦的任務！

所以要紀念廣暴，必須明確地認識廣暴，接受廣暴的教訓，糾正革命領導者一切的錯誤，實行左派反對派的正確路線，以便全副武裝迎接第三次中國革命高潮，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的殘酷統治！

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

（致北平友人的信）

托洛斯基

中國目前政治形勢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呢？兩個重要的革命問題——民族問題與土地問題——有了新的緊張。慢性的，蔓延的，而且一般說來是勝利的農民戰爭，證明了國民黨的專政絕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絕不能威脅農民。日本的侵犯上海和實際地佔領滿洲，表示出國民黨專政之軍事的薄弱。實際上，還未崩台的政權的危機，在最近幾年來，必然的深刻；軍閥的混亂，破壞了國內畸形的統一。

如果農民戰爭使那和鄉村有關係的知識分子激烈化，那末，日本的侵略，在政治上是推動了城市的小資產階級。這更使國民黨政權的危機加深。甚至一部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正在

得出國民黨是取得太多做得太少的結論，他們的結束國民黨訓政的要求，就是從軍事獨裁過渡到議會制度的要求。

在左派反對派刊物上，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有時候說做是法西斯蒂。這樣的定義，是因為在中國和意大利一樣，軍事的警察的政權，集中在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手裏，一切其他的政黨尤其是工人團體都是被除外的。但是，近幾年來有了史大林派對於法西斯的混亂概念的經驗之後，（譯者按：史大林派常把法西斯蒂，軍閥專政，及社會民主黨都看做是法西斯蒂）如果再把國民黨獨裁和法西斯看做一樣的東西，這是錯誤的見解。希忒拉和慕索里尼一樣，他們所依賴的首先是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法西斯的實質就在於此。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基礎的。同時在德國農民是跟著希忒拉跑，他們也間接的擁護巴本，在中國農民進行反蔣介石的劇烈鬥爭。

在國民黨的統治中，所含的波納巴主義（譯者按：即拿破侖軍事獨裁的意義）的成分比法西斯的成分要多：國民黨沒有如何廣泛的社會基礎，牠的所以能夠存在，就是由於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與革命的民衆運動之間的對抗。波納巴主義能夠得到鞏固，只有在農民的土地的餓斃得到滿足之後。但是這在中國連想像都沒有可能。因此軍事獨裁是無力的，牠只有在牠的敵人處在渙散的情形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在他們（即革命農民——譯者）的繼續增加的壓迫之下，牠自己反開始渙散了。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無產階級受到精神的和物質的打擊最是厲害。這一點說明了：爲什麼工人鬥爭現在落在其他的階級的後面，不僅僅落後於以學生爲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落後於農民。另一方面，很明顯的在工人階

級重新走上鬥爭舞台之前，中國第三次革命不但不能勝利，而且不能到來。

再沒有比革命的民主口號適合於中國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勢了。無論農民打起是什麼旗幟，但他們所執行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土地的民主任務，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再無須來證明了。中國獨立的口號，經過了這次日本侵略的證明，乃是民族的民主口號。軍事獨裁的無力，與軍閥集團的分裂，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號。

學生們呼喊：『打倒國民黨政府』！先進的工人是擁護這一呼聲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實行憲政。農民暴動，反對土地的束縛，軍事的官僚的壓迫和高利貸。在這些條件之下，無產政黨不能夠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號來，只有國民會議。

這就是說——你們問——我們向現在的政府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嗎？或者是我們自動召集呢？在現階段中這樣的提出問題，至少是太形式的。俄國革命在許多年的過程當中，是匯合了兩個口號：『打倒沙皇』！與『立憲會議萬歲』！關於誰召集立憲會議的問題，我們在很長的時期中是這樣的答覆：將來會實現出來的，就是在革命過程中所形成的階級力量的對比，會實現出來。對於中國，這樣的觀察問題也是正確的。國民黨政府在其崩潰以前，是否嘗試召集某種形式的代表會議；我們對於這一種嘗試的態度如何，就是說，我們利用牠來增進革命的利益，抵制或參加選舉；革命的民衆能否或能否勝利的提出獨立的政府機關，把召集國民會議的事件拿在自己手裏；在爲民族口號鬥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能否創造自己的蘇維埃；蘇維埃是否召集多餘的國民會議

，這一切現在都不能預言。而我們的任務，也不在於作日歷式的預言，而是在於動員工人團結在由政治環境中所產生的政治口號的周圍。我們的戰略，是革命的行動的戰略，而不是抽象的猜測。

現在革命的煽動，首先應該盡可能的向著反對國民黨政府方面進行。我們向羣衆解釋：蔣介石的獨裁是走上國民會議的主要的障礙物，把中國從軍閥集團下解放出來，只有武裝暴動才是可能。無論是關於什麼具體問題之口頭的與文字的煽動，罷工，露天大會，示威，抵制，都必須加上『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

爲要達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須推翻國民黨。但這不是說，我們把反帝鬥爭放在推翻國民黨之後。反對外來壓迫的鬥爭愈擴大，則國民黨愈困難。我們愈能使民衆反對國民黨，則反帝鬥爭也愈擴大。

在日本侵略的最緊張時期，工人與學生要求武裝。向誰要求呢？還是向國民黨要求。以我們要推翻國民黨爲根據，而反對這種要求，這是教派式的盲目。要推翻，但尚未推翻。愈熱烈的要求工人武裝（譯者按：如組織工人義勇軍，要求發給槍枝等），愈快的推翻了牠。

中國正式黨雖然是極左的，但提出了『恢復中蘇邦交』的要求；同時這個口號是向着國民黨政府提出來的。提出這種要求，絕不是說『信任』國民黨，恰恰相反，牠的目的是使國民黨在民衆面前更處於困難的地位。國民黨個別的領袖已經表示出不得不伸說恢復中蘇邦交的理由。我們知道這些先生們的話離事實還很遠。但是這裏和一切其他的問題一樣，首先是歸結於民衆壓迫的

力量。

如果在革命民衆的鞭策之下，國民黨政府在上地問題中採取局部的讓步，嘗試召集類似的國民會議，迫不得已與工人武裝，或者恢復中蘇邦交，不消說，我們馬上利用這個讓步，緊緊的抓住牠，同時撤頭撤尾地證明牠的不夠，變國民黨的讓步爲推翻牠的工具之一。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策之革命的與改良的一般的相互關係。

農民戰爭的發展，是不是說在中國已經沒有議會民主口號和任務的時間與空間？我們再轉來說這一問題。

如果中國的革命農民稱自己的戰鬥機關爲『蘇維埃』，則我們沒有理由否認牠們以此稱呼。不過只是不要爲名詞所迷惑。認爲在純粹農村中的蘇維埃政權能夠是澈底革命的和鞏固的，這就是最大的輕率的表現。我們不能夠輕視蘇維埃政權真正勝利的唯一國家的經驗（譯者按：即指蘇聯）。雖然在聖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的工業區。蘇維埃政權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便經常的穩固的存在，但在其廣大的周圍（烏克蘭，北高加索，外高加索，烏拉爾，西伯利亞，中亞細亞等處）蘇維埃政權幾次的發生，幾次的失敗；這不僅僅由於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而且由於內部暴動的結果。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是純粹農民的，純粹在城市圈之外的，牠還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基礎。因此，牠很少有鞏固性和可靠性，牠很少有蘇維埃的政權性。

按照德國 Rote Aufbau 雜誌上郭林（中國人名譯音）君的上篇文章中說，似乎在紅軍的成份中，工人佔百分之三十六，農民佔百分之五十七，智識份子佔百分之七。我相信，這個數目字變

我生了很大的疑心。如果這種比率對於所有暴動的武裝力量（依著者的意見現在有三十五萬人）來說，那末，在軍隊中，工人便有十二萬五千人。如果百分之三十六的比率僅僅就紅軍來說，在十五萬的紅軍兵士當中，工人就有五萬多。是這樣嗎？再則：這是什麼工人？他們從前參加過職工會，黨，革命的鬥爭嗎？但是這還不能夠解決問題。在工業區域中，缺乏有力的，獨立的無產階級組織的條件之下，革命的工人缺乏經驗，或者僅有很少的經驗，大多數難免要溶化於農民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中。

在今年初，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王明（中國人名譯音）的一篇文章中，我認為是大大地誇張了城市運動的發展，並誇張了在這運動中工人的獨立和共產黨的影響。最不幸的是現在的正式刊物無情的修改事實，以維持他們小組織（按：即史大林派）的利益。但是在王明的文章中，也不難看出去年秋季開始的運動當中領導權是屬於學生的。大學生的罷課比工廠中工人的罷工所發生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提醒工人，增大他們的力量，使他們有可能抓住民族的和土地的運動，因以領導這兩種運動，這是無產階級的直接要求的任務，如像工作時間，工資，組織，應該成爲我們煽動的基礎。但是僅這一點還不夠，提拔工人階級到民族的領導地位的作用，現在有三個口號：民族獨立，土地歸農民（貧農），國民會議。

史大林派認爲暴動的農民既然稱自己的組織爲蘇維埃，這就是表示革命的議會制度已經是過去的階段了。這是很大的錯誤。暴動的農民能夠成爲無產階級蘇維埃的支柱，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只有無產階級在事實上證明給農民看他們能夠領導農民。

國民會議因其集中的意義，遂成了土地革命發展中最重要的階段。農民『蘇維埃』與『紅軍』的存在，只是幫助選舉革命的代表。只有這樣，才能在現階段中把農民運動同民族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在政治上連繫起來。

中國正式黨宣布革命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爲其現在『主要的和中心的』口號（見共產國際雜誌一九三二年第一期王明的文章）。這是片面的而且是冒險的提出問題。成爲中國無產階級重要任務的反帝鬥爭之徹底勝利，毫無疑義的只有暴動和革命的戰爭，再無別的方法。但是絕不能由此即得出對日宣戰是現在的中心口號。這一問題須要由國際的觀點下來解決。

在今年之初，共產國際認爲日本所開始了的壓迫中國的軍事行動，必然要馬上轉變爲反蘇聯戰爭。當時我曾說，東京政府在其滿洲地位未得到相當的鞏固之前，而行反蘇聯戰爭的冒險，是完全喪失了頭腦。對於我這種估計的回答，美國的最愚蠢的——愚蠢中的最愚蠢的——史大林派說我是爲日本參謀部的利益而服務……但是最近幾月來的事變告訴了些什麼呢？日本的統治階級的驚慌，反對軍事冒險的結果，大大的增加了。日本軍人不得不派遣人員到Peking去提醒天皇政府執行佔領滿洲到底。毫無疑義的，反蘇聯戰爭在現在還是很現實的前途。但是在政治上，時間是有重大的意義。

如果蘇聯政府承認同日本戰爭現在是不能避免的，那末他便沒有權力，便沒有可能進行和平政策，即鴉鳥政策。實際上，蘇聯政府在這一年的當中，同日本締結了漁業協定，提出了供給日本戰艦的煤油協定問題。如果戰爭現在是不能避免的，那末供給日

本煤油，便就是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叛變。在這裏我們將不來討論蘇聯政府所採取的實際步驟和聲明是如何的正確。不過我們必須明白一點：莫斯科的史大林派和美國的史大林派是正相反的，他們採取了同日本的和平政策而不是戰爭的政策。

九月二十四日的真理報說，『世界資產階級以最大的耐心等待著日俄戰爭……但是蘇聯在中日糾紛中的嚴格的中立與堅決的和平政策。戰勝了這種衝突』。如果美國及其他各國的咆哮之徒的態度，是有某種實際的意義，那末牠只有這一意義：即他們是推動蘇聯走上世界資產階級所希望蘇聯所要走的道路（按即日俄戰爭的爆發），我們絕不願意這樣說，他們是自覺的爲了日本參謀部服務。但他們之不能自覺的服務於無產階級革命，這是明顯的了。

中國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旗幟上所寫的不只是恢復中蘇邦交，而且是同牠訂立進攻的和防守的密切聯盟。這是說明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策是關係於國際的環境，首先是關係於蘇聯政策的表現。如果日本今天開始了反蘇聯戰爭，掣牽中國到這個戰爭中來，這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是生死問題。但是國際的環境和內部的條件迫使蘇聯在遠東採取很審重的讓步，以避免戰爭！就是說儘可能的拖延戰爭，而日本表示出沒有力量開始仇視的行動，則對日宣戰的口號，無論如何不能成爲中國共產黨實際的戰鬥口號。

王明引証了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下面幾個口號：『恢復民衆運動』、『召集國民會議』、『恢復中蘇邦交』。他因爲這些口號是在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合法機關報上所說出來的，所以是壞的，

王明就稱中國左派反對派爲『托陳反革命集團』。

退一步說，就使這些革命的口號得不到羣衆的擁護，但也不能說這些口號的本身和提出這些口號的組織之本身是反革命的。而王明必要說牠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

史大林派對於我們——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間中國事變過程中所證明的正確的左派反對派——特別的嚴厲，而對他們自己，就是對他們的不斷的錯誤，則特別的寬宥。

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大林和馬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從第二次革命時起，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沒有削弱，而且加緊了。中國的發展同帝國主義統治之間的矛盾也增加了；因此史大林的舊的四個階級聯盟的理論又得到了加倍的力量。同時史大林派解釋國民黨的提議，說是新的欺騙民衆。對呀！但是他們忘記了說明，爲什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當中共產國際的領導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實行欺騙到底？爲什麼服務於國民黨的哲學，在共產國際綱領中寫了下來？

不消說，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地方的民主和地方自治，官吏民選等等口號。民主綱領對於軍事獨裁的統治來說，乃是一很大的進步，只是必須把個別的與局部的民主口號，每次都要歸結到主要的口號，並且同革命的團結及工人的武裝任務連繫起來。

『愛國主義』同『民族主義』的問題，如在你們信中有其其他問題一樣，名詞方面比內容方面注意得多。布爾塞維克以革

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來援助民衆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運動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是，我們能不能把已經被奸污了的『愛國主義』的名詞來利用？我是懷疑的。在這一企圖中，是否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和名詞的傾向呢？這樣的傾向，如果牠是在我們的隊伍中真正發現時，應該給以無情的打擊。

許多戰術和戰略的問題，如果形式的提出牠們來，使不能得到解決，但是如果辯證的即從實際鬥爭，階級，和黨的前途上去提出來，那末牠便馬上會得到解決。革命的辯證法在實際行動中最好領會。我完全相信，我們中國的同情者，朋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不僅僅熱烈的討論複雜的中國革命問題，而且熱烈的參加擴大的鬥爭。我們應該擁護行動的戰略，而非揣測。

托落斯基
於泊俞克泊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

怎樣去正確認識和領導目前的『紅軍』鬥爭

彭述之

一、『紅軍』的階級性

史大林主義者幾年來將農民的武裝隊伍，甚至將土匪隊伍，都冠以『紅軍』的頭銜，這顯然是一種指鹿爲馬的滑稽勾當。其實真正的紅軍，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有成立的可能。因爲真正的紅軍乃是由無產階級和貧農所組成的一種正式軍隊，譬如蘇俄的紅軍便是十月革命勝利的產品，其本身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

，紅軍是絕不能組織成功的。

但現時在中國的所謂紅軍，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家都能記憶，此種『紅軍』的產生，不是由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恰相反，而是由於失敗。現時『紅軍』中最老的隊伍，如朱毛所領導的，主要成份乃是過去革命的殘餘勢力。換言之，即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尤其是湘鄂贛的秋收暴動賀葉兩征和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在湘鄂贛等省參加暴動失敗的農民和曾經參加革命或表同情於革命的兵士及其他革命份子等所混合成的。後來再加上國民黨軍隊許多潰兵和當地土匪的參加以及各地被白色恐怖壓迫無法存身的農民之投奔，最後就是因農村經濟不斷破產和水旱天災所逼迫的破產農民和災民之匯合，因而勢力日漸擴大。這便是現時所謂紅軍的形成史。顯然的，此種『紅軍』的構成份子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其中無產階級的成份十分微弱，即貧農的成份亦不十分強。其中有很大數量是中農，遊民無產者，（潰兵與土匪等），乃至富農等。像這類份子雜湊起來的隊伍，不但絕不能與蘇俄革命勝利後的紅軍比擬，而且其中顯然包含有十分危險的成份。如果妄冠以『紅軍』的頭銜，不但名實不符，而且在將來的革命中留下魚目混珠的危險。因爲此種『紅軍』在將來城市無產階級真正起來奪取政權時，究竟能否擁護無產階級而不爲其他資產階級政派所利用，還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但史大林主義者何以不惜將『紅軍』的王冠套在此種複雜隊伍的頭上呢？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企圖藉此以遮掩他們過去機會主義失敗的罪惡，權作冒險主義的盾牌，以欺騙或炫耀無產階級和一般民衆而已。

然而如果我們將史大林主義者套在現時湘鄂贛閩皖等省區那

些武裝隊伍頭上的『紅軍』頭銜攔在一邊不提，那究竟此種隊伍算是一種什麼的武裝呢？當然絕非統治階級所誣蔑的什麼『遊民土匪』，固然其中含有不少的潰兵和土匪等，但其主要的成份還是農民，其傾向亦是代表農民的，即要求土地和反地主豪紳及國民黨軍閥之剝削和壓迫的。所以此種隊伍，無論其成份如何複雜，其傾向如何不純，但就一般說來，始終不失為農民的武裝，不失為一種反國民黨政府的革命勢力，這是絕不容忽視和否認的。

二、『紅軍』中所包含的矛盾與危機

但當我們估量『紅軍』的作用和運用這一革命勢力時，我們亦絕不應忽略此種勢力中所包含的矛盾和所具的危險性，只有預先明白瞭解真正的矛盾及其危險性，才能採取適當的策畧去防止和糾正牠。

『紅軍』所包含的成份既一般是農民，則我們必須知道農民本身的弱點。農民的弱點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觀念。他們之起來參加革命，當然不是爲了贊成或信仰社會主義，而是反抗地主豪紳軍閥和貪官污吏等種種經濟政治上的壓迫，要求分配土地等。但土地一旦到手之後，他們是很容易後退的。因此，農民不能同無產階級一樣，能具世界眼光，能預見遠大的將來。在另一方面，農民缺乏組織的習慣，缺乏自動自覺的精神，尤其缺乏集體的精神。所以農民不是處於散漫狀態，就是容易爲某種領袖所利用，尤其在軍事組織中，農民往往變成某一軍事領袖的工具，同時農民是富於地方性的，因此又容易受領袖們的操縱，形成各種地方性的小派別。至於游民無產者，除了具有農民一般的弱點之外，還有他們特有的冒險性和腐化性。所以歷史上（資本主義社會前期）一切農民運動，結果往往爲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領

袖以至地主貴族所利用和出賣，卒至完全失敗絕對不是偶然的。

固然，現時的『紅軍』中，已經有了現代無產階級的成份。而且有其產黨的領導，但無產階級的成份既然十分微弱，當然很難影響於農民羣衆，而且有時反爲農民意識所同化；共產黨人在『紅軍』中形式上確佔領導地位，但在史大林主義的壟斷包辦之下，不惟沒有能糾正農民和游民無產者的弱點，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弱點；他們本身久已與農民和游民無產者同化，並達到最尖銳的程度。譬如現時史大林主義者當中的冒險情緒，官僚主義，以個人或地方關係爲中心而結合的無原則的小派別等，固然有其『國際的』來源，但中國的農民和游民無產階級對於他們亦不無相當影響。尤其在『紅軍』中，以地方或個人（主要是軍事領袖）爲中心而結合的小派別，更是表現得異常厲害而普遍。但那些小派別之間，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分歧呢？沒有，只是在他們個人間，軍事領袖間或地方黨部間（實際還是軍事集團間）有某種利害關係不同而已。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此種危險，過去黨的領導機關不惟沒有事先設法防止牠糾正牠，而且是盡力促成了牠。譬如朱德和毛澤東原是很合作的，但李立三爲了要打擊毛澤東，便不惜使用種種詭計鼓勵朱德反對毛澤東，會逼迫毛澤東不得不離開井崗山而遭一度嚴重的失敗（見一九二八年冬毛致中央局的信）；後來陳紹虞派爲要在『紅軍』中造成已派的實力，更是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此外，凡是反對中央（不論立三派的中央或陳紹虞派的中央）的都派遣到『紅軍』中去，這亦是促成和加深『紅軍』中派別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這不是領導，而是在『紅軍』中製造危機。尤其重要的，是史大林主義者對『紅軍』在政治上所犯的錯

誤。他們把『紅軍』誇大成爲解放中國無產階級的『天使』，一面在城市工人階級中散布對『紅軍』的幻想，同時在農民中散布對城市無產階級的輕視心理，破壞農民對城市無產階級領導的信任。對富農始而採取優容妥協的態度（六大決議案謂『不要故意反對富農』，李立三謂『富農是革命的』，致使在『紅軍』中，在『蘇維埃』中，以至在黨的組織中，富農份子曾佔在領導的地位，如A B團，四軍中的許繼慎，福建的林某等，使『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嚴重的危機。但後來他們碰到事實的打擊，在所謂反立三路綫之下又直接抄襲史大林在蘇聯的方法，企圖簡單地從軍事上和行政上去消滅富農，但結果又引起了中農的動搖和跳，甚至『反水』（見湘鄂西省蘇區的工作報告——紅旗第四十期）。

最後，在『紅軍』中，只看見軍事領袖的權威，絕看不到黨的領導力量，『紅軍』中的黨團，實際上不過一附屬的駢枝機關，不僅不起任何領導作用，而且連會議也是不召集的。至於地方黨部，常常爲流氓分子（名義上算是無產階級）所把持，當然說不上有任何共產主義的意識，對農民羣衆往往發生了很壞的影響，所以在許多地方都發生『紅軍好，土共壞』的歌謠。總之在『紅軍』中差不多完全抄襲了國民黨的『軍權高於一切』的傳統，黨只是軍隊的附屬品而已，在羣衆中替軍隊作點宣傳工作而已。此種情形，在黨的刊物中（來自蘇區的報告）亦隱約表露出來。

以上這些矛盾，這些危機，一半固然是在城市無產階級革命潮流未起來時客觀上所很難避免的，一半却是由黨領導機關的策略和官僚制度所造成。而黨的官僚機關爲了要在城市工人階級面

前，甚至在一般黨員羣衆面前誇耀『紅軍』的勢力藉以維持官僚們破產的權威，便不惜將『紅軍』中一切矛盾，一切危機掩飾起來，其實這種辦法除了養癰遺患之外，沒有其他意義。但我們爲了瞭解真相起見，爲了真正擁護和領導農民的武裝運動，糾正其錯誤，使其能得到政治的出路起見，必須照實揭露出來。只有不害怕真理的人，才能真正擁護真理。

三、『紅軍』在現局勢中的意義及其前途

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紅軍』裏面包含的矛盾與危機，當然不是說此種武裝隊伍現在已走到不能發展或行將消滅，或在現時的局勢中沒有任何作用。事實上，『紅軍』在現時（編者按：約五六月時）是向前發展的最好機會，並且在目前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中，無疑地站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去年秋天的大水災和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的經濟愈趨衰落，尤其農村經濟愈陷於破產而絕無出路的境地，再加上國民黨軍閥貪官光棍們的盡情搜刮。逼得農民只有走上鬥爭的道路；在另一方面，國民黨在滿滬事變中已完全暴露了牠的卑鄙無能，牠的投降賣國，不但引起了一般民衆對牠的憤懣，即在資產階級，甚至牠自己的黨員羣衆中亦喪失了對牠的信仰，因此引起了民衆對國民黨的反抗（如搗毀黨部，毆打黨國要人等），國民黨內部更深刻的分裂，國民黨政權的動搖；尤其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財政現時差不多已完全陷於無出路，黨政教育等機關都只能發半薪或三分之一的薪水，軍隊欠餉則有至一年或半年以上者，一般兵士都陷於飢餓之中，軍隊（特別是蔣系的雜牌軍）時時有叛變瓦解之虞（最近孫連仲部下及湖北安徽好些軍隊叛變投降『紅軍』就是事實）。在這種情形底下，國民黨政府當然再沒有多大力量

來對付武裝的農民（現時蔣介石親自出馬進攻『紅軍』，事實上不過爲掩飾他對帝國主義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討好於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及保持他武漢南昌等大城市的地盤而已。他至多只能防止『紅軍』進攻那些大城市和截斷京漢長江等重要的交通。在現時消滅『紅軍』不但不可，即防止其發展亦很困難）。這些都是十分有利於『紅軍』發展的客觀條件。何況城市中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民族民主運動已在開始復興，工人運動也開始活躍，這對於農村的武裝運動更有決定的影響和意義。

反之，在現時的局勢之下農民武裝運動的發展，對於城市的民衆運動，無疑地亦有鉅大的影響，因爲他們能在許多鄉村和小城市中摧毀了國民黨的統治勢力，而且威脅到大城市（如武漢與南昌等）。所以我們認爲在目前反日反國民黨的運動之下，現時的農民武裝運動，已具有新的重要的政治意義，已經非三年前的那種『紅軍蘇維埃』可比。因此我們認爲現時『紅軍』不應只採取消極保守的態度，而應謀積極的發展，儘可能在各方面削弱國民黨的統治。

但是要領導『紅軍』向積極方面發展，首先就必須根本改變黨整個的政治路線。黨必須將農民的鬥爭與城市的民族民主鬥爭聯系起來。黨必須堅決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以作此種聯系鬥爭的總口號。黨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領導國民會議的鬥爭和城市的工人運動。只有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運動的鬥爭變成中國全民族實際鬥爭的目標，城市的工人運動走到真正復興的地步，鄉村的土地鬥爭，農民的武裝運動，才能有政治的出路。

黨如果改變了總的政治路線，在『紅軍』中的策略上當然亦應加以積極的改變。黨應公開地明確地告訴『紅軍』中的先進份

子；現時的所謂紅軍，絕非真正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武裝，只是一種農民的武裝隊伍，而且其中還已含有不少危險成份；農民武裝運動的出路，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領導之下，在無產階級已有力來推翻國民黨統治階級的政權之下，才有可能；應使農民相信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在『紅軍』中應確定對於富農的策略，應提高黨的領導作用；『紅軍』的基礎應建立在貧農和雇農之上；應根本消滅一切以個人或地方爲中心而結合的無原則的小組織，防止軍事領袖的跋扈（即在農民武裝隊伍中防止新軍閥的形成）。總而言之，黨的策略應立即脫離農民和游民無產者的原始意識，恢復無產階級的立場。目前的農民的武裝運動才有前途。

但我們以上的提議，唯一正確地領導目前農民武裝運動的機會，正式黨的領導機關，史大林主義者，『紅軍』中的實際領導者，是否能接受呢？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與提議，他們都是不願意接受的，他們寧使任何革命運動，任何羣衆鬥爭失敗（最近的電話工人罷工就是最現實的例證），而他們的成見，他們的『權威』，他們的『顏面』，是非保存不可的。如果他們始終拒絕我們的提議，不顧一切地一意孤行，則目前的農民武裝運動，不但要錯過目前最有利於其本身發展的機會，而且是放棄推動中國整個政治運動走上革命局勢的機會。這樣，則『紅軍』在相當時期內不但沒有發展的可能，而且其內部的矛盾與危機將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形成內部的嚴重糾紛以至瀕於崩潰。固然，此種農民武裝隊伍，即令外部（國民黨軍閥）如何壓迫，內部如何分裂，完全消滅雖然很少可能。但到那時，其存在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然而在現時，城市的一般的民主民族運動和工人運動尚在開始向復興的道路前進，鄉村的農民鬥爭還儘有發展的可能。我們希望每個真實的革命份子，尤其共產主義者和「紅軍」中的革命家，應立刻起來重新分析「紅軍」的真實狀況，正確認識此種武裝隊伍進在目前民主鬥爭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應向史大林主義的錯誤領導作堅決的鬥爭，這不但是擁護目前湘鄂贛閩皖豫等省的農民武裝運動的惟一有效辦法，而且是推動目前中國整個民族民主運動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之起點。(五·二〇)

上海電話工人罷工的教訓

(本為轉載上海反對派機關報「火花」編者) 世瑤

此次上海電話工人的罷工鬥爭，於六月七日下午五時，首先由各行自動機間的發動，在八日十二時以前，整個的電話工人卒先後一致的罷下來了。鬥爭的結局雖不免於失敗，然以電話工人之散處四方，平素又缺乏組織，一旦罷下工來，卒能堅持至十三日之久，這種英勇鬥爭的精神，確是不能夠抹煞的！

這次的鬥爭，其影響的範圍是這樣廣大，內容是這樣的複雜和豐富，它不僅教育了羣衆，而且教育了領袖及共產黨——首先是深刻的教育了我們反對派，因為這個鬥爭勝敗的關鍵，在某種意義上講起來，確是落在我們反對派的手中。事後的懊悔固無補於既往，然而詳細檢查出過去所作的錯誤，公開的指摘出來，以保證這些錯誤不至於在將來的鬥爭中再被發現，這却是列寧主義者所應有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把每一個階段中我們和史大林派的不同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在實際鬥爭中所發生的影響，有系

統的加以分析和了解；基於這些實際鬥爭的教訓，才能以改正我們的錯誤和弱點，並可更有效的去糾正史大林派在中國工人運動中所鑄造的罪惡。

罷工之準備

上海電話公司自從自動機的裝置逐漸的達到告成之境，資方方面即已不斷的開除工人。在去年工會成立之後（這個工會在二二八事變以後，即已無形消滅），工人羣衆中即已開始醞釀着鬪爭的情緒，唯以二二八戰爭之爆發，突使上海的廣大工人，陷於失業的狂流，電話工人又因受着戰爭的直接威脅（電話工人十分之七是住在閘北），所以罷工的條件一時反而不易成熟。那時史大林主義却都想人工製造電話工人的罷工，以作為全上海總同盟罷工的先驅，終以「羣衆不革命」而未能實現他們那種神奇的策畧。

迄乎戰事結束以後，整個上海的中外資方，將戰爭所受的損失，一齊加諸工人頭上，工作時間加長，工資不斷的減少，勞動條件的降低，使工人達到不堪忍受的地步。而電話資本家對於工人之進攻，自然亦不肯甘居人後；這自然會要重新喚起電話工人積極起來鬥爭的需要。我們反對派及時的認清了這個新的局勢，了解鬥爭的條件，是日益走近成熟了，其具體的反映有以下三點：(一)由於資本家之不斷的開除工人，大批工人從生產地位上被排除出來，而陷於失業的痛苦；(二)按年加資和禮拜日假日雙工制之取消，工人被資本家榨取了更多的無償勞動；(三)一班從華洋德律風公司一直工作到現在的老工人，他們是渴望拿到他們一生辛苦所應得的養老金，而資本家則藉故不發，有時且無故沒收。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羣衆的煩惱，不滿和憤激，其前途自

然會很快的走到鬪爭，但是我們認定這些客觀條件之反映到羣衆鬥爭的情緒，還未深入化和普遍化，羣衆的主觀力量——特別是組織力量，還未有及時抓住客觀情勢而取得勝利之可能，其主要困難點有三：（一）沒有團聚工人鬥爭力量的組織，過去所成立的工會，久已失去作用而無形消滅了；史大林派所領導的抗日會，不過是個空頭機關而已，在緊急關頭，工人尚全然是一種散漫的狀態。（二）由於工人之散處四方和電話公司生產行政組織之繁雜，在宣傳和實際組織上，一時難於奏效。（三）自動機關的工人，固然情緒激昂，具備了鬪爭的勇氣，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社會出身，完全導源於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他們之投身工人的隊伍，爲時很短，素無鬥爭的經驗和缺乏組織，容易流於輕舉妄動，另一方面是因爲他們都具有相當的文化程度（一般的自動機關的工人，大都是中等學校學生出身的居多），對於資本家之壓迫和剝削，自然是易於反映和引起其鬪爭的心理，可是大部分外部工人，特別是老工人，他們雖感着有被開除的危險，希望立刻取得養老金，然而正因爲怕開除，怕失掉養老金，而不敢輕於鬪爭。關於鬪爭之形勢和前途上，我們估量到挾有雄厚資本的電話資本家，如果工人鬪爭起來，必然會採取十分強硬的政策，只有堅固的持久的戰爭，才能克服資本家頑強的抵抗而取得最後的勝利。基於這種估量，我們認定在罷工以前，必須有明確的鬪爭綱領，作廣大的鼓動和宣傳，以發動罷工，在實際組織上，不僅要形成能夠包括各部門工人代表的領導組織，而且各部門工人的本身，亦須有堅固的團結，這些準備工作做得愈充分，則鬪爭愈能早發動，而且愈能持久和愈有勝利保障。

史大林派的策略，則與我們顯然不同，根據那個破產的總同

盟罷工的路線，他們的哲學是「罷下工來再講」鬥爭前途怎樣？鬥爭能否取得勝利的收束？羣衆的準備工作應該怎樣進行？所有這些，他們完全置之不顧。他們以爲罷工之加速實現，不在於怎樣來努力加速準備工作的過程，而只是在於怎樣來提前決定罷工的日子而已。因此，他們一切策略的決定都是朝着這一大前提進行，其結果自然要影響這次罷工流於過早的爆發，埋伏下前途的危機。

在罷工以前兩星期中，經過我們和史大林派共同的活動，曾召集了三次各代表會議。這代表會議的成分極不健全，電話公司的三大部門，除了自動機關稍多幾個人外，其餘建造部只有一個代表，新裝修部則完全沒有一個人，此外便是正式黨的官僚機關爲了操縱會議而調動去的機關中人物。這種情形本是事前佈置上的絕大弱點，而這種弱點則正合於史大林派命令主義的需要，他們自始至終一貫的精神，便是把準備罷工和領導罷工的機關儘量設法縮小，小到不須費神說服只須命令的程度，以便實現其機關領導的作用。比方他們在對罷委問題的討論中，曾一再提議實際縮小罷委的方範，如設立五個人的常務委員會的主張，以及『在主席團中設立委員長一人』的主張都是，這正深刻表現官僚領導害怕羣衆的心理，我們瀋西區委，在準備工作的緊要關頭，沒有能夠找住這個關鍵和史大林派積極鬪爭，沒有積極設法擴大代表會議，動員更多羣衆中的積極分子參加進去，使罷工的準備工作能以在更廣大的羣衆基礎上進行；却反而在那種不健全的代代表會議之前束住了自己的手足，以致在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上，不唯不能實現我們正確的主張，並且無以糾正史大林派自動主義的危險傾向——這正給予史大林派以機會，使其能以過早的把無充分戰鬥準備的部隊領到戰場去，俾易爲敵人所擊潰（爲什麼

他們要這樣幹，這在我們給正式黨的一封信中已有說明。

他們屢次在代表會議中做了些什麼工作呢？什麼也沒有做，除了鬼鬼祟祟的點火藥引子而外。比方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中，什麼也不談，他們馬上造出一個謠言來，說海寧路行已經罷工了，要各行馬上起來響應，希圖藉此使代表會議拋開一向必須的準備工作，立即乾脆的發下一紙罷工命令。從某種意義看來，這種陰謀手段和策略，正好是布朗基派行運的絕妙寫照。

我們在代表會中雖曾歷次說明不宜輕率發動：應該在羣衆的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上，在罷工綱領之普遍宣傳和各行罷委乃至總罷委之如何產生上，事前作一番充分的準備；輕薄的官僚主義者如何能有這種羣衆工作的耐心，他們以為要作準備工作便是『不要鬥爭』，要鬥爭便應該對於罷工的日期首先提出決定，於是『一切重要的羣衆工作，一進被擱置在一旁，而亟亟於作日期決定的競賽去了！』

史大林派之盲目與愚蠢，即便從日期問題的決定上亦可以看出得出來。本來，按照他們那種「罷下來做再講」的哲學，他們那時所要的事，自然只是決定罷工日期而已，所以第三次代表會上，他們竟一再堅持要決定在九號罷工。雖然經過我們和一些非黨工人領袖之反對，認為是過於倉卒，但絲毫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為什麼決定在九號呢？罷工日期之決定，其嚴重性自然不能與決定暴動日期相比，但也是不好隨便胡亂來確定的。決定在九號有什麼意義呢？我們的同志在史大林派的壓迫之下，既然無法挽回這種形勢，於是便也只好從日期問題上想出補救的辦法。最後我們不得已而提出七號罷工的主張。或者有人會以為七號的決定比九號更為盲動；其實，如果要早罷的話，則七號確是比九號為

好，這對於罷工的臨時發動有更多的幫助：一則因為七號是發工錢的日子，羣衆有天然集會的機會，便於進行鼓動和傳播罷工的消息；二則次日為舊曆端午節，一部分工人消息，容易取得一致罷工的步驟。如果放過這天然的機會而決定在九日，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不一定能普遍罷下來，而能下來的一部分必將受到資本家方面更嚴酷的打擊，即此一端已可充分看出史大林派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是如何的粗暴與不注意！

事前的準備是如此的未被注意，而日期的決定又如彼的草率，嬰兒的早產，違背了母親的機體，還未成熟的過早爆發的罷工，埋伏下了前途失敗的種子。

(未完)

什麼是革命的形勢

托洛斯基

(一)由革命的觀點作形勢之分析時，必須分別革命形勢的經濟的社會的前提，和革命形勢的本身。

(二)革命形勢之經濟的社會的前提，一般說起來是在一國的生產力不是向上而是低落的時候，存在的。那時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特殊的重量不斷的減輕，各階級的進款同樣的不斷減少；那時失業不是由市況盛衰而生的暫時的現象，而變為社會的痼疾，且有增長的傾向，所有上述的特點完全表示現在美國的形勢，我們可以斷言，革命形勢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前提，在這種形式之下，是在那裡存在的，並且永遠在加深。但我們不能忘掉革命形勢這個字，是一個政治的名詞，不僅僅是社會的名詞，這名詞所表現的意義，包括着主觀的條件，而主觀條件不僅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他是整個階級的情緒 (morality) 的問題；當然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和其政黨的情緒的問題。

革命形勢之開始

(三) 革命形勢只在革命的經濟和社會的條件在社會和社會中許多階級的情緒上，引起破裂的時候才開始存在。要形成革命形勢，必須先引起什麼些變化呢？

(a) 在我們必須分別的，任何情勢中，必須分別社會的三個階級；資本公司，中間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表明革命形勢的特徵的各階級情緒的變化，對於這些階級中每一個都是非常不同的。

(b) 英國無產階級對於經濟情形是非常危急這一點，比一切理論家懂得多。但是只有當他們開始不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而是取革命暴動反對現制度的道路而找求他們的出路的時候，革命形勢才開始存在，這是形成革命形勢的最重要的主觀條件。羣衆革命情緒的高漲，是測量革命形勢成熟與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

(c) 但是一個革命形勢是這樣的形勢，必須在接着的第二個時期，使無產階級能夠成爲社會的統治力量，這件事須視中間階級的政治思想和情緒而定（在英國雖比別國不重要些，但亦相當重要）；革命形勢之特徵，在中間階級對於一切舊政黨的失去信仰（工黨亦在內，牠是改良主義——即保守的。）而轉移其希望于社會的激烈的革命的變化（而不是希望反革命的變化——即法西斯蒂的變化）。

(d) 無產階級與中間階級情緒之變化，都是和統治階級的情緒之變化相應而發展的，統治階級此時沒有辦法維持舊制度，自己也失去了自信，牠解體和分裂爲許多派別和黨羽。

各階級形勢之轉換

(四) 在這些過程中的那一點上，革命形勢是完全成熟了呢

？這是不能機械的預言和指定的。革命政黨只能由自己的戰鬥，自己力量的發展，由其對於羣衆，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影響，由統治階級抵抗力的削弱來證實這個事實。

(五) 若我們以這個標準應用到英國的情形，我們能看見：

(a) 上述的經濟和社會的前提是存在了，並且變得更有方面更深刻；

(b) 雖然如此，但是從這些經濟的前提達到心理結果的橋樑還未渡過。在英國要形成革命形勢不必經濟情形發生大的變化，因爲牠現在已全然無可忍耐了，所必要的是各階級的情緒，對於英國這樣無可忍耐的危急的經濟情形，要有一個新的配合。

發展的速率

(六) 社會中經濟的變化是很慢的，是用幾百年幾十年來計算的。但是當經濟情形已經變化了的時候，落後的心理因子的變化能很快的發生；不論快慢，這種變化必不可避免的在各階級情緒中引起，只有那時候我們才遇到了革命的形勢。

(七) 革命形勢這名詞，作爲政治名詞時，牠的意義是：

(a) 無產階級必須不但對保守黨、自由黨、失去信仰而且對於工黨失去信仰，他們必須集中意志和勇氣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

(b) 中間階級必須對於大資產階級和地主失去信仰，把視線移到革命的無產階級身上。

(c) 富有的階級統治的政派爲羣衆所唾棄失去了信仰。

(八) 這些現象不可避免的要來的，雖然今天並不存在，牠或許在短期間因深刻的恐慌而發生，牠或許在二三年內發生，或許在一年內就來；但是這是一個預料而不是今天的事實，我們的政策必須建立在今大的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依據明天的事實。

老練的無產政黨之絕對的重要

(九) 革命形勢的政治條件，大致是平行而同時發展的，但是並不是說，一切在同時成熟；這一點是明日英國情勢之危險所在，許多正在成熟的條件中，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最是落後，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總的革命的轉變和政治上統治階級的解體，不一定沒有超過無產政黨的成熟而發展的可能，即是說，或許在明天以後，真正革命形勢已存在，而沒有勝任的革命的黨之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復演德國一九二三年的情勢。但是今天若斷定英國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是完全錯誤的。

(十) 我們說黨的發展不是沒有落在革命形勢的其他要素之後的可能，——但這不是在任何情勢之下都是不可避免的事，關於這個問題我不能做嚴格的預斷，但是問題不僅是預斷，而是我們自身行動的問題。

(十一) 在資本主義社會，目前的情形中，英國無產階級要和三個資產階級政黨脫離關係還需要多少時間呢？若無產政黨有準確的策略，這個過程很可能隨着這些黨的破產和解體同程度的進行，這個可能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責任。

正在發生些什麼

結論：這已充分的說明爲什麼說現在英國是在民主和法西斯蒂之間是完全錯誤的。嚴正的說起來，法西斯蒂時期之開始是在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得到重要的有絕對勝利之後，但是英國偉大的鬥爭並不在我們的後面，而寧可是在前面；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已討論過。更可能的，英國政治史上下一章在國民政府和保守黨政府（這或許繼前者而來）解體之後，將是自由黨和工黨的改良主義時期，牠在最近將來能比法西斯蒂的怪物更危險，我們

有條件的叫那個時期爲英國的克倫斯基政府。

但是必須補充的說，克倫斯基政府不一定在任何情形之下，在任何國內都和俄國的一樣無力，俄國克倫斯基政府之所以無力，是由于布爾什維克的偉大勢力。例如，我們現在看西班牙的克倫斯基政府——自由黨和社會黨的混合政府——並不如俄國的那樣無力，這是共產黨弱小的緣故；因此，成爲西班牙革命之大危險。克倫斯基政府的意義，在我們是表示改良主義的，「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語調之採用，和某種次要的民主的和社會的改良；而在一方面同時對於工人階級的左翼進行壓迫。

牠用的方法和法西斯蒂相反，但目的則一。要削弱將來的路易喬治政府，只有我們預見牠的迎來，只有我們不爲法西斯蒂的怪物所催眠（牠比路易喬治和其明天的工具——工黨更這些），才有可能。明天危險的可能改良主義的黨，即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聯盟，法西斯蒂時期的鬥爭，和消滅或縮短新的改良主義時期的鬥爭，在共產黨方面，表示着爲奪取工人階級而鬥爭的意義。

一九三一，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大學學生青年援助陳獨

秀

北京大學學生方面最近會募捐二十餘元，作爲陳獨秀同志在獄之用，並發出通電二則，反對國民黨壓迫革命領袖。北大數百學生青年並不因史大林派之造謠而傷而減少對獨秀同志的援助，（但北大教授一個子

不捐)可見愈造謠中傷，愈暴露其路綫及禁制之破產罷了！現在我們把募捐啓事及通電錄後：

諸位師長同學：

自本校舊教授及中國革命家陳獨秀先生被捕以來全國各地文化機關及青年學者多已紛起援助；陳獨秀先生於新文化運動及本校光榮歷史有特別的功績，所以我們北大師長同學似更應有援助的表示。近年來並聞陳獨秀先生仍在努力提倡社會主義革命，並為我全國人民反對法西斯政治爭取所謂「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則我們援助他，更是尊重老革命家的堅苦卓絕精神之一種表示。

現在我們大家打算：

- (一) 募集一筆款項送到南京監獄作為他的醫藥費用。
- (二) 拍發通電給南京政府及全國民衆團體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先生更不得加以任何虐待。

(附電稿)

(1)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陳獨秀先生乃有功於中國之人物，此次被捕，尤違反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等自由之原則，盼即日釋放陳獨秀先生，更不得加以任何虐待，特電。

北大陳獨秀先生後援會叩 月 日

(2) 全國民衆及民衆團體公鑒：中國新文化運動導師陳獨秀先生被捕，實違背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等自由之原則，祈各界一致起援，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先生及其他牛蘭等一切政治犯，並抗議一切虐待，特電。

北大陳獨秀先生後援會 月 日

國際左派反對派鬭爭情報

希臘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的工作

Archio 馬克斯主義者在級階鬥爭中領導工人

A.S.S. 鐵車譯

我因為擔任反對派國際書記局的工作，特去訪問希臘的同志，同他們逗留了四天，我知道希臘左派反對派在那青年勞動階級的運動中，已成為一種領導的革命勢力。我必須說明這個事實，就是整個的革命運動，不論黨或反對派，都受了白色恐怖威脅，反共法與特別法庭盛行，只要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團體的會員，就會遭受嚴酷的刑罰（近來是五年至六年的徒刑），結果，黨與反對派均工作在嚴格的非法狀態之下。

可是不論以上的各種情形，左派反對派的人數仍是很多，總計全希臘黨員，現在大約已有一，四〇〇人。他的最堅強的組織，是雅典 (Athens)，帕拉斯 (Piraeus) 與薩耶尼基 (Saloniki)，這些都是希臘最重要的工人運動的中心。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一，四〇〇黨員，都無例外的是堅強的建築在全國羣衆組織的上面。

一切工作，都嚴密的分配在黨員中間，每人的活動，都在正確的監督之下，所有同志，都正確的報告他的活動，每月兩次，而且一種真正的集體的合作，支配於組織中。我有機會和一種來自薩尼基的同志談話，他們是到雅典來開會的。他們幾乎無例外的都是工人，他們是勞動運動中最有訓練的幹部，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活躍，對於左派反對派的見解，具有深刻的信仰，同時，他們在工人當中執行一種不倦的肅清內部的鬥爭。

希臘的反對派，名為「Archio-馬克斯主義者」，人數遠勝過於黨（史大林派），不僅黨員的人數，而且是在反對派印刷品者

的方面，至於質量的優越，更不必說了，就使黨比反對派在國會選舉上會多獲選票，但我們必須注意，黨乃執有蘇聯（U.S.S.R.）及第三國際（C.I.）旗幟的威權的。在選舉以外的一切活動中，例如組織的勢力，雖然證明不屬於黨，而是屬於反對派，反對派享受希臘勞動階級的信仰。我們讓事實來說明吧。

出版品方面

我們的同志過去出版的雜誌是每個月兩期。現在則每禮拜出版兩期，銷售達六至七，〇〇〇冊。我們同志現在正在發行，或促進發行下列在其影響下的刊物：（1）理論雜誌，每月一期，銷售達四，〇〇〇冊。（2）工會之在我們影響下者，發行刊物猶多，皆全依我們左派反對派之路線編輯。我們僅舉其最重要的來說（a）面包工人月刊，（b）鞋工月刊，（c）歐戰殘廢兵士所發行之月刊——「犧牲者之音」，（d）為學生發行的月刊。上刊的每種，有六至七，〇〇〇份的銷售，且分配於全國。所有這一切工作，在左翼工會中都是受左派反對派的嚴密組織下的分子所支配和領導。

（3）公司和銀行從業者工會，出一月刊。本同盟有一，二〇〇會員，完全接受左派反對派的政治路線。所有出版本刊的同志，都是過去黨的同志。下週他們還要出一種猶太文月刊，「無產階級」，在薩郎尼基付印。

政治活動方面

這方面首先包含在反恐怖與反動鬥爭中，反對派向黨提議形成一種聯合戰線。黨（即史大林派）不會答覆。他們甚至表示

拒絕。不過在兩位黨的士兵黨員，被判為死罪的案件上，聯合戰線是執行了。在雅典大學的前面，組織示威，這次示威中大多數為左派反對派同志；示威者同警察舉行一嚴重衝突，若干同志受傷，若干被捕了，唯有一位同志，得發表一篇演說。

跟着示威到法庭上，正當開審兩位士兵，一位反對派同志只是因為諷刺法官及鼓動聽眾之故，被判決四年徒刑。其講詞中有下句：「工人們生產反而受餓，你們紳士先生們無所事事，而享受人間的幸運！」因這種對法官的侮辱，我們同志竟判了四年的徒刑。但這種行動，在將來和黨聯合戰線的進展上種下了好的結果。黨的同志開始瞭解，「Arch-馬克思主義者」并非「Arch-法西斯蒂」，而是會和黨聯合進行反對敵人的鬥爭。

失業鬭爭的方面

自一九三〇年的正月以來，開始組織失業工人的鬥爭，在不斷的同警察衝突中形成了。在雅典，帕拉斯有五十名失業者組成一委員會，在薩郎尼基委員三十人，他們指導此等組織。近來，一般羣衆會議也組織成了。在雅典有一，〇〇〇人的參加者，在帕拉斯有一，五〇〇人，薩郎尼基約二，〇〇〇人。在薩郎尼基的一次失業者會議上，為軍警所襲擊，受傷了許多人。我們的活動獲得很大的結果，失業者已得了自由之湯。我們反對派首先舉行為失業工人的需要的鬥爭，黨（史大林派）的舉行還僅僅是以後的事。我們還必須指出一椿事，那就是：階級的敵人，及其野蠻的武裝軍警，在反對派與黨之間，是沒有分別的。

戰爭孤兒的示威，這裏亦須一述。我們舉行示威通過挽尼羅魯斯（Neros）的政治機關之前，在這次示威中約有一，〇〇〇人參加。在抵抗警察的當中，很多的受了傷。

（待續）

托落斯基重視非洲工人加入

左派反對派

(一) 非洲黑色工人加入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美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同志們：

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最近開幕的大會中，全體簽到的黑人同志都決定加入你們的同盟（即左派反對派——編者）。至於你們托找革命文字的代理機關，我們完全同意，我們希望每星期送九十二份 Militant 報來，這些報我們希望和你們代售並把錢退回你們。我們特別願意把他介紹給非洲黑人的工友們，而且爲了使牠有效地發展起見，我們已經選出十二個同志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又請把你們的組織大綱寫廿四份來，廣告紙如你們認爲必要也寄送十二份；又你們如有多餘請隨時送些宣傳品及小冊子等類的東西來。

我們首先見到的 Militant 報是第五輯，總目爲九十七期，出版期爲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這裏面有一篇論文，叫做「史大林和中國革命」，不過因爲我們得不到上面幾期所以很爲遺憾。這包括那篇論文頭一部分的幾份報，是否還有着？如有則請你們在下次郵寄的時候，寄兩分來，我們打算保存着做我們的參考文件，

諸位同志們！不要因爲所有這些請求者是黑人便生了氣，而且以爲我們是有意的拒絕和歐洲方面的同志携手。不，不是這樣的。我們考慮加入你們的同盟，不過是大約兩個月以前的事。一

個黑種同志去聯合一個歐洲同志雖是困難，我們總希望不久白種戰士將學着我們的樣子聯絡起來。種色問題使組織發生了困難。甚至在革命的組織上，黑種人們普通也被看做較卑下的，而歐洲工人們却被看做較高等的。我們現在已於在非洲共產黨的名義之下開始工作了。

簽名的黑種同志誓願接受你們的領導，誓願爲了樹立革命運動，爲了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非洲共產主義而奮鬥！

我們是：（簽名）

托落斯基論非洲工人加入左派反對派的重大意義

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國際書記局轉

美洲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

我接到四月二十六日從約翰尼斯堡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對於我似乎有一種非常的預兆的意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能夠而且應該成爲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受壓迫的部分的標幟；因此首先也就代表了黑種工人，我的這樣假定，有什麼根據呢？

左派反對派在現在代表世界上最嚴密最革命的潮流。牠在整個工人運動中對於全部或者每一種官僚主義思想的形成之嚴厲的批判態度使得牠特別注意到工人階級與其他勞苦羣衆最底受壓迫的部份的呼聲。

左派反對派不但遭受全世界資產階級政府的壓迫，而且同時還遭受史大林官僚機關的壓迫。這一事實，不管所有的壓迫

，只要她漸漸深入羣衆的意識中，就會吸引國際工人階級之最受壓迫的部份的同情，而跑到左派反對派方面來。由這一點看來，南非洲同志寄給我們的信，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預兆的。在這封二十四個人署名（下面還注明：「其他等等」）的信當中，南非的同志對於中國革命表示出特別的注意；這種注意我們認為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正是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工人羣衆，他們爲了最基本的民族權利與人類正義而鬥爭，而由於史大林官僚主義在「民主專政」的混亂教育遇到莫大的危險。在這種欺僞的旗幟之下，國民黨式的政策，即中國勞苦羣衆被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所欺騙和打敗的政策，仍然可以給勞苦大衆的解放以絕大的危害。不斷革命的政綱已是許多國家中不可否認的歷史經驗所證實了的東西，牠可以而且必須成爲黑種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最重要的指標。

假如約翰尼斯堡的同志，在其他一切嚴重的問題上仍然沒有充分了解，那並不能阻碍他們在今天就與反對派密切地携手而且還會幫助他們走上我們的政綱與戰略的正軌。

當十個巴黎柏林或紐約的智識分子——他們曾經在各種不同的組織內的，——還要求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就要這樣的提議：把他們在政綱的各種問題上經過許多試驗，把他們淋在雨裏，把他們晒在太陽底下，然後再經過一番小心的考察，才允許他們中間的一個或兩個加入我們。

可是當十個與羣衆連繫的工人走向我們這方來，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我們對小資產階級和我們對無產階級之關係的不同，還是不用再加以說明的。但是假如無產階級羣衆在一個地方工作，這個地方有各種不同種族的工人，而工人裏面包含着一個有特權的

民族的工人時，那麼，我必要發生懷疑考察他們：他們是不是貴族工人呢？他們會不會積極的或消極的保留着榨取與壓迫的遺毒呢？

當黑種工人接近我們時，事情就又完全不同了，我們已經預先考察到：雖然事情還沒有明顯的表白出來，我們和他們聯合是會成功的；因爲在他們的整個地位上，他們不從事也不能從事於抑制別人，壓迫別人，剝奪別人的權利。他們沒有特權可得，他們除了世界革命，沒有別的道路可以爬到上面來。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找出一條道路給這些覺悟的黑種工人，中國工人，印度工人，以及所有人類中的被壓迫的有色人種，人類發展的命運，決定在他們身上。

——托洛斯基——
一九三二·六·十三。

請看馬哲民底裸體跳舞（續）

敬言

四、政權性質問題

關於這一個問題，馬哲民首先便說：「中國不會有純資產階級性的政權」。在這裏，馬哲民是企圖以修詞學代替階級的分析，什麼叫做「純資產階級性」？現代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純資產階級性的政權」嗎？美國的共和黨政府或民主黨政府，英國的自由黨政府，都是除開資產階級的利益，毫不代表其他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嗎？「純資產階級性的政權」在歷史上是未有過。馬哲民謂「中國不會有純資產階級性的政權」是什麼意思呢？對於我們和對於廣大的讀者，毫無疑義地，他的中心意思是在說明：目前國民黨的政權，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

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或者差不多是和以前的北洋政府一樣的東西。不錯，現在的南京政府不止是代表中國工商金融的大資產階級底利益，也代表地主底利益；同時，參加南京政府的人員，也有不少的地主和北洋軍閥時期的舊官僚們。但我們却要問：在南京政府中起統治和領導作用的是那一個階級呢？是資產階級呢？還是所謂「封建地主」呢？祇要他不是吃了資產階級底迷魂藥，有意替資產階級賣力的人，毫不游疑地會肯定地答復，在現在的南京政府中起統治和領導作用的是工商金融大資產階級。至於國民黨資產階級政府爲什麼會代表地主底利益，會容許那們多的大小地主的代表參加？這個問題祇能在中國經濟底有機體中，即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利益已成爲不可分離的有機的東西；中國的地主已經沒有一個不資產階級化，同時鄉村資產階級如富農高利貸者等也或多或少帶些「封建剝削」性的。馬哲民企圖以什麼「純資產階級性」的修詞學代替馬克思主義底階級的分析，除淆亂眞理外，再無什麼旁的意義。

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蔣介石上海大屠殺之第二日，便宣佈中國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明顯的此種事後罵人的辦法，已是証明其無明確的瞭解中國資產階級底根性。但這裏我們不再重述上面的話），而幾個月之後，以蔣介石爲中心的國民黨南京政府，便又被稱爲「封建勢力佔優勢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見共產國際六大綱領）。階級性的變動原來是這麼奇突呵！

爲什麼共產國際執委會前後如此的矛盾呢？這內裏也有牠的苦衷在。因爲如果承認國民黨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便不得不承認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得到了反革命的勝利，便不得不承認中國第三次革命必然只好是無產階級革命，可是

這樣一來，便等於打牠自己的嘴巴。牠之稱國民黨政府爲「封建勢力佔優勢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政府」，不過是用來以掩飾其葬送中國革命的罪惡，隱匿大革命給予的教訓罷了！

馬哲民一方面說「中國不會有純資產階級性的政權」，另一方面則承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繼國民黨政權的是「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底階級性，不是資產階級的麼？列寧評斷他這個公式的性質說：「工農民主專政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最高的形式」。又說：「工農民主專政，就是適合全體農民（富農在內），資產階級中立，推翻封建制度」，無論牠「高」到什麼程度，牠總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試問中國這個階段有沒有過去了呢？我們要的已是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領導貧農的政權——如蘇聯那樣的）了，讓孟塞維克還要工農民主專政吧！

五·國民會議問題

在革命底現階段中，用國民會議做爲黨底總的政治口號，這是左派反對派同史達林派爭論的中心問題之一。離開列寧主義千里之遠的馬哲民，自然更不會瞭解這個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之應用。他說，左派反對派既承認中國第三次革命底勝利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在現在却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爲什麼是矛盾，馬哲民却未告訴我們。列寧領導之下的布爾塞維克就在這樣的「矛盾」中生長起來的，十月革命底勝利是在這樣的「矛盾」下獲得的！立憲會議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爲俄國社會民主黨之主要的政治口號，我們固無用去遠溯，專就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史來說吧。

勝利的二月革命把政權交給了俄國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

民主任務。二月革命並未能完成，然而這仍不能阻礙列寧提出他的四月大綱。布爾塞維克這時的總的政治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依列寧底話，這蘇維埃是「工人政府的萌芽」，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經過七月的事變之試驗，布爾塞維克馬上提出「打倒十個資本家的總長」的口號，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這是很明顯的了，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已經決定了勝利的俄國革命，是結束資產階級政權，開闢人類的新紀元——無產階級專政。但布爾塞維克這時放棄了立憲會議的口號嗎？沒有！從二月革命那一起至十月暴動那一日的前一分鐘止，立憲會議的口號永遠是布爾塞維克奪取廣大羣衆——不止是小資產階級羣衆，農民，而且是工人羣衆——的有力的口號。在「面包」、「土地」，「和平」，「立憲會議」等口號之下，布爾塞維克打敗了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在這些口號之下，布爾塞維克領導廣大的羣衆奪取了政權。這是多們大的「矛盾」啊！

馬哲民反對國民會議口號之應用的第二點，他說國民會議是空洞的口號。國民會議真是空洞的嗎？只有不了解牠的實際內容的人，才會這樣說。在國民黨的軍事獨裁統治之下，在沒有革命高潮的時候，在左派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用國民代表會等口號欺騙羣衆的當兒，澈底民主的國民會議是共產黨團結工人和農民羣衆的主要口號。此所以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塞維克黨雖在十月暴動的前夜及其後，仍不放棄立憲會議的口號。馬哲民謂國民會議是空洞的口號，是因爲他把這個口號同其他的政治口號隔絕起來了。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在中國目前提出這個總的政治口號，是把他同「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上地歸貧農」聯繫起來的，正如在十月暴動之前，布爾塞維克把「

面包」，「和平」同「立憲會議」的口號聯繫起來一樣。「立憲會議」本身當然是「空洞的」，不過這「「空洞的」的東西偏偏是發動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等大革命的有力武器呵！

六·結論

上面說的這幾個問題，都是中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和重要問題，也是我們左派反對派同史達林派爭論的重要問題。這幾個問題底正確的認識，是決定正確的政治路線之前提，也可以說是決定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的關鍵。半孟塞維克的「理論家」馬哲民，企圖在這些革命的根本問題中打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際戰鬥員，只是表示他的反動的劣根性！

在結論中，關於陳獨秀被捕和中國的正式黨對這次事件的態度，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

在陳獨秀被捕之後，資產階級的報紙，藉機大施其造謠手段，對於這個無產階級的領袖極盡其誣蔑的能事，什麼「請求謁蔣」，「讀三民主義」等等。這乃是資產階級對革命的領袖常用慣的手段，我們早已洞悉其奸。最可惜的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史達林派，在此事件上完全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對陳獨秀個人以及整個的左派反對派，俯拾資產階級報紙的造謠，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來誣蔑這個革命的領袖。在黨底機關報上，刊物上，宣傳品上，肆意造謠誣蔑，大有非國民黨把這個革命的領袖殺害不足以解心頭之恨的氣概。這何止是幸災樂禍，而且是催促國民黨資產階級屠殺革命戰士！

官僚主義的史達林派卑鄙無恥的造謠誣蔑，侮辱反對派，竟爲資產階級所不屑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胡適之，蔡元培

，宋慶齡，楊杏佛等之爲陳獨秀緩頰，正等於他們之營救牛蘭一轍。然而官僚主義者史達林派却藉此大造謠言，說這是「國民黨保護托陳取消派」，蘇聯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把這一事件也是迷惑蘇聯工人的階級意識，以「托洛斯基主義者得到國民黨的保護」來標題。失掉階級立場的史達林派們，請你們細思吧，現時之營救陳獨秀者，就是當年營救牛蘭者那幾個人。他們的階級性前後是沒有半點變動的。如果說這是左派反對派得到了國民黨的保護，那麼，中國共產黨史大林派「得到國民黨的保護」還在左派反對派之前！這個話只有離開階級立場的官僚主義者才說得出來，廣大的革命的工農羣衆，是認識異常清楚的！

黨號召羣衆起來反對法西斯蒂，反對白色恐怖，反對國民黨的屠殺，逮捕，監禁革命者。然而當白色恐怖已竟臨到革命底領袖的頭上時，黨却告訴民衆說：「這不是白色恐怖，你們不要反對」。這樣，黨只是迷惑羣衆的階級意識，使他們認不清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緩和他們的政治覺醒，因之也就是緩和革命的到來。在這一事件上，史達林派的官僚主義者不特是離開了階級立場，而且已是向着反動方面走了一步！投機的，無恥的馬哲民用在利用黨的錯誤路線，向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惡毒進攻，這當然是他盡忠於資產階級的地方，不過革命民衆是不會饒赦他一分一釐的！

更正

先鋒第二期「西班牙革命通訊」末段本刊「記者附誌」，犯有重要錯誤，從該段第三行「不料西班牙……」到第六行「……已經過去了。」應全作廢，應更正爲：「西班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正在眼前經過，而第三國際史大林派如拉迪克等竟說：『西班牙現在沒有什麼大事』，『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還未到來』！」

級民權革命正在眼前經過，而第三國際史大林派如拉迪克等竟說：「西班牙現在沒有什麼大事」，「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還未到來」！」

中國革命與斯大林派

不日出版

革命的青年們：要瞭解中國過去革命失敗（一九二五—二七）的教訓，要把握目前革命的形勢，更緊認識中國第三次革命前途的性質，請趕快閱讀本書。本書著者托洛斯基陳獨秀等，每冊定價五角，先鋒各代派處均有出售，頭版無多，購者從速。

先鋒社啟

十二月廿日